

國學小叢書

章實齋年譜

胡適著
姚名達訂補

著者 胡適
訂補者 姚名達
主編者 王雲五

國學
叢書

章

實

齋

年

譜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國難後第二版

(二八六三)

國學章實齋年譜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胡

適

訂補者

姚

名

達

主編人兼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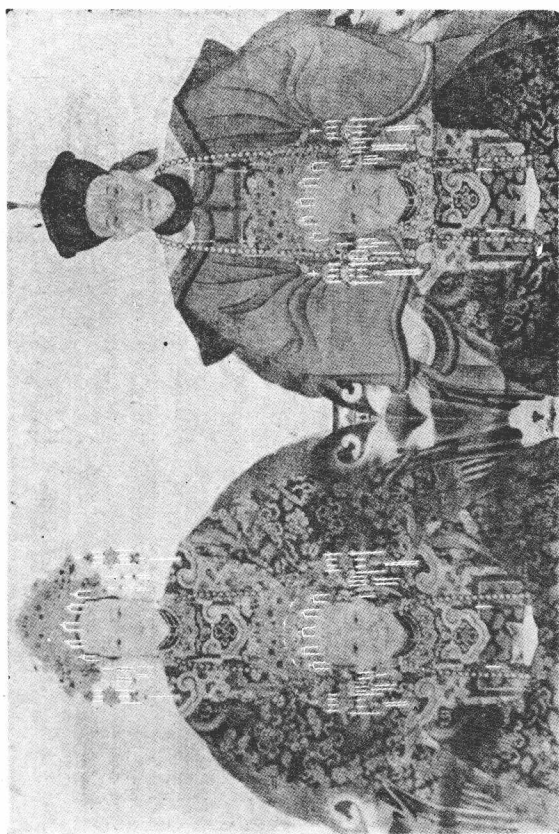
上海河南路

上海河南路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年譜之體，仿於宋人；考次前人撰著，因而譜其生平時事，與其人之出處進退，而知其所以爲言，是亦論世知人之學也。文集者，一人之史也。家史，國史，與一代之史亦將取以證焉，不可不致慎也。」（韓柳年譜書後）

章實齋先生夫婦遺像



姚蓬人先生熱心搜求實齋傳記材料，果然訪得此像，可謂有志者事竟成了。胡適記

何序

替古人做年譜完全是一種論世知人的工作，表面看去好像不過一種以事繫時的功夫，並不是很難；仔細一想實在很不容易。我們要替一個學者做一本年譜，尤其如此；因為我們不但對於他的一生境遇和全部著作要有細密考證和心知其意的功夫，而且對於和他有特殊關係的學者亦要有相當的研究，對於他當時一般社會的環境和學術界的空氣亦必須要有一種鳥瞰的觀察和正確的了解，我們纔能估計他的學問的真價值和他在學術史中的真地位。所以做年譜的工作比較單是研究一個人的學說不知道要困難到好幾倍。這種困難就是章實齋所說的『中有苦心而不能顯』和『中有調劑而人不知』，祇有做書的人自己明白。

胡適之先生的章實齋年譜就是這樣做成功的。我記得當民國十一年二月商務印書館把這本年譜印好寄給他的時候，他曾經有下面這一段日記，我現在替他發表出來，來證明我上面所說

的話並不是一種玄想。他的日記上說：

『此書是我的一種玩意兒，但這也可見對於一個人作詳細研究的不容易。我費了半年的閑工夫，方纔真正了解一個章學誠。作學史真不容易！若我對於人人都要用這樣一番工夫，我的哲學史真沒有付印的日子了！我現在只希望開山闢地，大刀闊斧的砍去，讓後來的能者來做細緻的工夫。但用大刀闊斧的人也須要有拿得起繡花針兒的本領。我這本年譜雖是一時高興之作，他卻也給了我一點拿繡花針的訓練。』

適之先生此地所說的甘苦，我們看了誰亦要表同情。不過他說這本年譜是他的一種玩意兒，一時高興之作，我個人卻不敢同意。我以為適之先生所說的一種玩意兒，一時高興之作，正是章實齋所說的：『天下至理，多自從容不迫處得之；於心欲有所爲，往往不如初志。』所以就我個人講，一面想到做年譜這種工作的困難，一面看到適之先生這本年譜內容的美備，我實在不能不承認這本書是一本『即景會心妙緒來會』的著作，不是一種『玩物喪志無所用心』的玩意兒。這種工作當然不免有疏漏的地方，但是我們坐享其成的讀者卻不應過度的去求全責備。

今年秋間王雲五先生因爲很賞識適之先生這本年譜，所以要把他選入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裏面去，預備將版式改排。適之先生知道了，就很虛心的趁這個機會託一個對於章氏學說很有研究的人代他增補一下。這位受託的人就是剛從北京清華研究院畢業南下旅居上海努力讀書的姚達人先生。當達人先生進行他那增補工作的時候，他每星期總要到我的家裏來交換一次我們對於史學的意見。他因爲研究章氏已經三四年了，身邊又帶有充分的材料，所以能够從九月到十月不滿一個月的工夫就完成他的工作。我知道他實在補進了不少的材料，而且有一部分材料是適之先生當時還沒有發見出來的；因此這本年譜的內容更加美備了。

達人先生增補完工之後，就把這增補本交給適之先生去校正。適之先生看了一遍完全同意；並且向達人先生說：他近來聽見我對於章實齋的史學已經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所以要叫我代他們兩人再做一篇序表示我近來的心得。當達人先生把這話告訴我的時候，我很是遲疑，但是亦就立刻答應。

章實齋在文史通義匡謬篇中曾經說過：『書之有序所以明作書之旨也，非以爲美觀也；』這是

一句很合理的話。我們應該服膺他。我既然不是做這本年譜的人，當然不應該談這本年譜的『作書之旨』。適之、達人兩位先生和我三個人既然多少都是私淑章氏的人，那末適之先生不該發起叫我做這篇序，達人先生不該附和他，我亦不該答應他。這是我所以遲疑的緣故。但是我當時反省了幾分鐘，終於答應了，而且自己覺得很有理由。

第一我和適之、達人兩位先生有一種特殊的交情。我和適之先生的文字交，始於民國二年的夏季。我記得當時他是留美學生季報的編輯，我是一個投稿的人。民國四五年間我和他纔在紐約常常見面談天，成了朋友。民國六年以後我在北京大學教了五足年的書，又和適之先生同事，而且常常同玩。他和我不約而同而且不相爲謀的研究章實齋，亦就在那個時候。結果他做成一部很精美的年譜，我做了一篇極其無聊而且非常膚淺的管見。我的翻譯新史學亦就是在這個時候受了他的慫恿。民國十一年後我到杭州辦了兩年最無聊的教育，受了兩年最不堪的苦痛。可巧這時候適之先生亦就在西湖煙霞洞養他的病；而且據我所知，這次的休養是他平生最長的一期。現在我們兩人又不期而然不約而同的在上海過活了。我以為就十七年來行止上看，我們兩人的遇合

很有點佛家所說的『因緣』二個字的意味。

至於我和達人先生的交情，比較的時間很短。我們兩人開始互通音問，不過三年；兩人見面不過數月。但是我看見他這樣熱心的研究章實齋，他今年夏天爲了研究章實齋冒暑到紹興去，到杭州去；我又看見他這樣熱心的努力學問，甚至辭去各地學校的聘請，單身自備資斧留居上海，壹心向學問上努力。我們看到現在中國學術界的情形和一般社會的風氣，對於達人先生這種心胸那能不肅然起敬呢？他在上海的時候，每星期總要到我的家中談一次話；而章實齋有時就做我們談話的中心。所以我們定交的時期雖短，交情卻已不淺。所以就我和適之達人兩位先生的交情而論，我雖然不敢以『章氏同志』的名義來互相標榜，我對於他們兩位研究章實齋史學的經過卻還配說幾句話。

其次我所以敢於承受他們的委託做這一篇序文的原因，就是我想趁這個機會，表示我自己一點懺悔的意思。我的研究章實齋大約在民國八九年的時候。現在自己回想那時候的情形，正像鄉下土老遊了半天的上海，就回家去向鄉下人大談上海的風光一樣，我那篇章學誠史學管窺的

文章就是這樣做成功的。我現在每每再讀一遍章氏遺書，總要回想到那篇膚淺貽笑的文章不該發表，背上總要流了一次汗。我因為要想利用這個機會說幾句懺悔的話，所以對於他們兩位的委託，不但_不加拒絕，反而極其願意了。

章實齋推崇鄭樵的時候，曾經說過：『自遷固而後，史家既無別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鄭樵稍有志乎求義。』現在我把他這幾句話來做一個比論。我覺得從前研究章實齋的人，恐怕都祇是求文史通義的事和文而不求他的義。從前的學者對於文史通義何嘗不看得很寶貴。我們祇要看章氏生前和死後一般學者爭讀或者爭刊文史通義的情形，真有「洛陽紙貴」的神氣。這種熱心章氏學說的人我們當然不能不表示相當的敬佩，因為他們總算是能够賞識文史通義的人了。但是我以為他們所賞識的部分和我們現在所賞識的部分，卻有根本上不同的一點：這就是他們所賞識的是文史通義中的事和文，我們所賞識的卻是義。

我覺得從前賞識文史通義的學者差不多可以分做兩大類：識見較高一點的，用經今古文的目光來觀察章實齋，硬要把他拖到『門戶』裏面去，把『六經皆史』這句話看做章氏一生學問

的唯一供獻。而所謂今文家中人亦就扭住了這句話來打倒文史通義的全部書。古文家誤以爲章實齋的文史通義是擁護他們的護符；今文家又誤以爲章實齋的文史通義是打倒他們的兇器。結果他們兩家都把章實齋看作『門戶』中人。我以為章氏固然是門戶中人；這種拖人下水使他同流合污的情形，在科學方法還沒有傳入以前的中國學術界誰亦免不了；這不是章氏的罪過。但是我以為章氏真正的面目和偉大的供獻，絕對不在『門戶』中，卻在門戶外。這一班學者就是我的比論裏所謂祇能賞識文史通義中的事的人。

另外還有一班學者很賞識文史通義中的文章，他們對於章氏討論課蒙作文等方法的文字，尤其傾倒到萬分。我以為他們這種識見實在是一種『帖括』的識見，亦是一種『骨董』的識見。他們所賞識的文史通義，是賞識『墨卷』，賞識『冊頁』。章氏的文章當然是模範的『墨卷』，和寶貴的『冊頁』。那是無疑的了。但是我以為章氏真正的面目和偉大的供獻，絕對不是他的文章，卻是他文章中所存的義。這一班學者就是我的比論裏所謂祇能賞識文史通義中的文的人。

我細細把適之達人兩位先生的著作讀了一遍之後，我敢說據我所知道的人而論，唯有他們

兩位纔真正能够賞識文史通義的義。我以為章氏的供獻，並不在事，更不在文，實在在義。這個義就是他對於史學的卓見。這種卓見最重要的，我以為有三個。我以為適之和達人兩位先生已經能够把他們提出來編到這本年譜裏面去了。但是因為年譜分年的緣故，這種卓見不能不分散到全書的各部分，讀者不容易一目了然；所以我在此地代他們兩位做一點比類的功夫，並且就把這一點功夫當做我自己近來研究章氏的心得，請他們兩位指教。

我以為章氏對於中國史學上的第一個大供獻就是記注和撰述的分家。換句話說，就是他能够把中國二千年來材料和著作畛域不分的習慣和流弊完全廓清了，而且因此能够把通史的旗幟樹得非常的鮮明奪目。這是章氏獨有的特識。原來自從唐代劉知幾首倡紀傳編年兩種體裁的學說以後，中國史籍上材料和著作的門類從此不分；而且這兩種體裁並亦從此變成我國史籍分類的標準了。所以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編年類的序裏面說：『司馬遷改編年為紀傳，苟悅又改紀傳為編年。劉知幾深通史法，而史通分敍六家，統歸二體，則編年紀傳，均正史也。』劉氏兩體說的根深蒂固，固定為一尊，就此可見一斑了。我以為我們倘使用史料的眼光去看我國這樣豐富的史籍，又

何必獨限兩體？照四庫全書的例分做十五類，亦何嘗不可？因為所有史籍既然都當做史料看，那末類例的繁簡在史學上就沒有很重大的關係了。

我國史籍的門類自從尊奉兩體爲正宗以後，不但所有歷史的著作，永遠在兩體裏面翻筋斗；就是通史一類著作亦幾乎從此失去了獨立的希望了。鄭樵雖然曾經辨明『史』和『書』的不同，而且高樹通史的旗幟，但是能够賞識他的人實在寥寥可數。四庫全書裏面別史一類，雖然大概都是含有通史性質的著作，但是總目敍裏所說的話，依稀恍惚，並沒有露出一點通史的意思；祇是在通志的提要裏面稍稍提及了一點通史的源流。紀昀的學問這樣淵博，好像還沒有見到通史是可以自成一家的一種著作。這不是材料和著作沒有分清的一種流弊麼？後來我國的歷史家尤其正史家看見司馬遷用紀傳的體裁得到了著作的美名，往往一心一意的去做所謂貌同心異的工作；因此我們就有了三國志新五代史和明史這一類不倫不類非驢非馬的作品。當作通史看，嫌他們太繁雜了，當作史料看，又嫌太簡單了。這不是材料和著作分別不清的又一個流弊麼？

章實齋見到了這一點了。所以他在史考釋例那篇文章裏面，雖然還說『紀傳編年未有軒輊』

的話，但是他對於材料和著作的分別看得很明，說得很透。他在書教篇裏面說：

『易曰：「筮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間嘗竊取其義以概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爲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爲圓。』

章氏此地所說的『撰述』，不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著作』麼？所以要是能够決擇去取例不拘常。他所說的『記注』，不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史料』麼？所以要是能够賅備無遺體有一定。他這種見解或者受了劉知幾和鄭樵的暗示亦未可知；因爲劉氏在史通史官建置篇裏面，曾經有過下面幾句話：

『夫史之爲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僞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必論其事業前後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

鄭樵在夾漈遺稿與方禮部書中亦曾經說過幾句驚人的話：

『有文有字，學者不辨文字；有史有書，學者不辨史書。史者官籍也，書者書生之所作也。自司馬以來，凡作史者皆是書，不是史。』

劉氏所說的『當時之簡』和『後來之筆』以及鄭氏所說的『書』和『史』顯然可做章氏所說的『撰述』和『記注』的張本。但是我們看到章氏所說的話這樣透闢，這樣明白，很覺得不是自己對於史學原理『心知其意』的人，決辦不到。

而且章氏對於材料和著作關係的密切看得極清，說得極精；比較劉氏單單說了『相須而成其歸一揆』八個字，真是大有『天淵之別』了。章氏在報黃大俞先生書裏說：

『古人一事必具數家之學，著述與比類兩家其大要也……兩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拙刻書教篇中所謂圓神方智，亦此意也。但爲比類之業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料可使著述出得所憑藉，有以恣其縱橫變化。又必知己之比類與著述者各有淵源，而不可以比類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類之整齊而笑著述之有所畸輕畸重，則善矣。蓋著述譬

之韓信用兵，而比類譬之蕭何轉餉；二者固缺一不可，而其人之才固易地而不可爲良者也。」

章氏此地用『韓信用兵』和『蕭何轉餉』兩句話來形容材料和著作互相爲用的關係，真可以說是深切著明天造地設的比論了。但是現在編纂我國國史的人好像還要努力追隨司馬遷的決擇去取，不屑做班固那種賅備無遺的功夫，那真章氏的罪人了。我國現在的史學界要等到西洋史學原理介紹進來以後，纔滿口高談『史料』二個字，真是有點不好意思呢！

章氏對於史學上第二個大供獻我以爲就是他對於通史這一類著作的觀念表示得非常切實，非常正確。我在上面曾經說過：我國史籍的門類自從尊奉紀傳編年兩體爲正宗以後，不但所有歷史的著作永遠在兩體裏面翻筋斗，就是通史一類著作亦幾乎從此失去了獨立的希望。所以劉知幾雖然露過一點通史的意思，鄭樵雖然有過通史的主張，但是四庫全書把通史歸到不倫不類的別史一類裏面去。獨有章氏對於這一點見得很到，他在文史通義裏面所發表的通史觀念真可以說是詳盡無遺首尾完具。通史的意義怎樣？通史的利弊怎樣？通史編纂的沿革怎樣？章氏對於這